



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中的 南洋书写

陈桃霞 / 著

20SHIJIYILAI
ZHONGGUOWENXUEZHONGDE
NANYANGSHUXIE



长江出版传媒
Changjiang Publishing & Media



湖北人民出版社
Hubei People's Press

武汉商学院学术资助 /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后科研基金项目 / 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



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中的 南洋书写

陈桃霞 / 著

20SHIJIYILAI
ZHONGGUOWENXUEZHONGDE
NANYANGSHUXIE

摘 要

清末以来,自王韬、黄遵宪、丘菽园、丘逢甲、严复、孙中山、胡汉民、康有为、梁启超、苏曼殊到许地山、老舍、郁达夫、刘大白、艾芜、聂绀弩、许杰、洪灵菲、杨骚等,有数以百计的知识分子与南洋发生了交集。他们也将南洋纳入个人的思考与写作视域,南洋成为他们生命中至为重要的一部分。戊戌政变后,流亡于槟榔屿的康有为写道:“居此余年,望如故乡。”聂绀弩在其《八十虚度二首》中自述:“南洋群岛波翻笔,北大荒原雪压诗。”艾芜、巴人、杜埃、陈残云、邓贤等作家在其人生的不同阶段也不倦地追忆、展示个人的南洋体验。可以说,南洋书写贯穿于 20 世纪中国文学始终,但学界对这些文本一直缺乏整体性观照。这与书写的零散、学界内外对其是否具有文学性的怀疑以及意识形态的影响有关。本书从文学园地中较少引起关注的视角出发,以“20 世纪以来中国文学中的南洋书写”为研究对象,在进行材料收集、整理与概括、归类的基础上,较为全面地梳理 20 世纪中国文学中“南洋书写”的概貌、流变与意义、缺憾。伏尔泰在其《风俗论》中写道:“欧洲的王室与商人,仅知在东方寻找财富,而哲学家则于此发现一新的道德的与物质的世界。”^①20 世纪中国南洋书写在以“南洋”为视域作全方位、多角度的思考以外,将笔触向纵深处掘进,“南洋”不仅是一个地理文化概念,也是一个浸染了知识分子主体精神和情感的复杂意蕴,构成了思考的起点和新的意义的辐射点。晚清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多有着流离失所、万端沧桑的经历,其南洋书写亦多镌刻着个体在这种境遇中的心灵体验与精神嬗变。本书对南洋知识分子的流浪、流亡、抵抗与牺牲、遗忘等历史命运进行考察,为理解中国近现代进程与丰富知识分子的文化心像提供了另一重视角,具有考证知识分子文化史与心灵史的意义。相对于已经引起学界热切关注的东洋、西洋书写而言,本书拓展了“20 世纪中国作家的域外书写和书写域外”的文学版图。可以说,正因为有了“南洋书写”,国人走向世界的图景才显得较为完整,而欲了解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全貌,就不可以仅仅局限于“东洋”与“西洋”。

^① 引自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33 页。

本书将分为现代南洋书写与当代南洋书写,二者构成一个整体性的文学文化现象。从横向与纵向的角度考察,20世纪以来,中国与南洋之间发生了什么?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在南洋的流亡、流浪、留寓与考察、游历同他们与东洋、西洋之间的交往、互动除地理文化空间上的差异外,在人生轨迹与思考路向上,有何联系与区别?大批国人迁移、寓居南洋,这一部分书写从人类学与社会学角度考察,又有何意义?由此,本书将以南洋书写者的双重文本(即书面文本与行为文本)为考察对象,静态与动态相结合,既描绘20世纪中国南洋书写的文学文化地图,也挖掘这种书写背后多元复杂的心态结构,并从现代与传统、东方与西方、革命与启蒙等盘旋一个世纪之久的命题进行历史与思想层面的考证、考察与分析。其中,现代篇以“南洋”为空间,主要以20世纪初至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南洋书写为研究对象,从时代背景、写作者的身份结构、文本形貌及其所承载的文学、文化与时代蕴涵出发,分为五四留洋作家群、海派作家群与革命作家群。此外,还包括许地山的宗教书写及部分近现代知识分子的南洋游记。当代南洋书写较为驳杂,在题材与主题上开始走向深沉博大,洋溢着慷慨淋漓之气。在对其进行总体分析的基础上,从远征军书写、传统作家群的书写及南洋书写的多元化三个角度进行分析。当代南洋书写对战争、政治、历史、民族、现代性、世俗化思潮等进行了持续深入的思考,革命占据主导,其中消费性开始凸显。

“救亡的焦躁与启蒙的崇高感交汇而成为新文学总体精神的悲凉气氛”^①,“由于民族的落后,人民的灾难深重,对中国的以爱国救民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形成了沉重的心理压力,持续几代知识分子心灵深处的焦灼感、迫切感、浮躁情绪,对他们的政治、文化选择,无疑起了重要作用”^②。“精神的自由无羁与解放、生命的轻松感,以及群体生命的内在凝聚力。对于深感压抑、孤寂与沉重的中国知识分子,这正是他们个体生命所最匮乏的,或者说是他们苦苦追求而始终不得的”^③,尤其在上半个世纪动荡无宁、灾难深重的历史语境中。现代南洋书写蕴含了中国近现代化的思考眼光,展现了丰富生动的社会历史内涵,显示了独特的思想文化意蕴,即在传统遭受质疑或急遽破坏的国内,中国知识分子在南洋独享着一个与传统文化相融相知的隐秘空间,传统经由知识分子的体悟、实践得以重生,并散发出持久的

① 谢冕:《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3页。

② 钱理群:《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79页。

③ 钱理群:《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61页。

魅力。20 世纪的中国是一个重返青春的世纪,也是一个面临艰难抉择的世纪。激荡的历史潮流将知识分子抛入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冲撞所形成的漩流之中,南洋书写也承载着他们对中国在 20 世纪如何衔接被近(现)代性进程所割裂的传统、实现民族自兴自强的思考。黄遵宪、康有为对佛教文化的思考内蕴着他们对中国传统在西潮冲击下的忧虑与自信;苏曼殊、许地山在南洋的孤身深入、参禅习佛寄寓着他们在载浮载沉的时潮中实现中印文化交融、佛儒文化汇合,继而探讨传统文化优劣得失的愿景;洪灵菲、巴人、郁达夫、杨骚则在战乱频仍中,实现自救与他救,在南洋体味着一种近乎道家虚静、无为的自然、本真状态。“就蓺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庄子外篇·刻意》)。然而,在短暂的游心之举后,近现代南下知识分子更多是以入世的姿态投入南洋,启蒙与革命的主题在他们的南洋书写中绵延不绝,并成为最大的命题,从而显示了这部分书写在葆有异域性的同时与本土实现交接,显示了它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深层联系。与现代南洋书写的复杂内涵相比,在当代南洋书写中,“南洋”逐渐成为一个承载国人独特命运的地理空间符号与历史文化符号。从革命作家群的外南洋书写开始,这一书写开始展示国人的不同生存景观,其中既有中国远征军的慷慨悲歌、原国军的仓皇奔袭、国际援共知青的历史创痛,也有华侨的艰难打拼、爱国护家。作为“南洋性”有时并非十分鲜明的书写现象,当代南洋书写展示了更为丰富的艺术思考。首先是写作群体的扩大,题材与境界的开阔。南洋与中国数世纪以来的历史命运都被作家们囊括笔端,不同群体的困窘、挣扎、沉浮逐一进入其视野,展示了国人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的不同生存样态,也体现了知识分子对传统的复杂况味;其次是思考的深入与审美意识的加强。南洋开始成为具有独特审美意义的符号,具有一定的本体色彩,艺术手法更为自由开放。现当代南洋书写在主题空间的开掘、知识分子文化心像的呈示与审美风格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延续性,都有着独特的文化学与社会学意味。

绪论阐述了本研究的缘起、研究对象、研究现状与研究方法;对 20 世纪以来的中国南洋书写进行宏观把握,挖掘其基本线索与研究意义,并将现代南洋书写与同时期的东洋、西洋书写进行分析、比较。相对于后者的现代、理性、节制、幽默、洋派、绅士风度、平民风格及展示弱国子民的哀痛而言,现代南洋书写普遍较为感性、闲适、传统、浪漫,知识分子的现代性焦虑得以舒缓,士大夫意识彰显,但儒家情怀使文本呈现出浓厚的启蒙与革命色彩。

第一章主要探讨五四留洋作家群的外南洋书写。这一群体的书写在想象中兼有启蒙与家国之思。老舍对康拉德的帝国神话进行逆写,有着明显的革命隐喻意味,且开启了现代南洋“童话书写”模式;徐志摩以“南洋”展开情欲想象,预示着“南洋”

符号化的开始;在自我放逐南洋的过程中,郁达夫的书写蕴含着故国之思与家园之痛,作为流亡者心曲的古典诗词是其士人情怀的回归,也是对黄遵宪、丘菽园等近代南洋书写者古典诗词传统的延续。

第二章主要探讨许地山的南洋书写。作为少有的从文化认同的视角对南洋表达真实的热爱的作家,许地山的南洋书写在宗教思想的烛照下彰显了传统文化的独特趣味与情怀,体现出与五四新文学迥然有别的品格,他所塑造的艺术形象以深邃的宗教意识在20世纪享有特别的意义。

第三章主要探讨海派作家群的南洋书写。张爱玲的南洋书写是一种基于“他者”的文化想象;徐訏、刘呐鸥、张资平都将南洋情欲化、浪漫化,显示出经当时传媒塑造与定型的南洋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影响。总体而言,这一群体的书写在较为自觉的审美追求外,具有“自我东方主义”色彩,但缺少对南洋的社会历史思考,所展示出来的只是单向度的南洋。

第四章主要探讨游记作家群的南洋书写。在梁启超、斐儿与巴金笔下,“南洋”被赋予了古朴、神秘、浪漫的气息。他们悠然沉醉于山水风光的清新俊逸之中,以生活政治抵抗解放政治,从而获得暂时的越界。他们的南洋书写体现了传统游记文学的安适、闲逸。黄遵宪、康有为、丘菽园等士人的南洋书写具有较为强烈的政论性与传统文化色彩,是作家传统情怀与近代意识相结合的产物。对南洋历史与现状的思考显示了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在变革时代运命的忧思。

第五章主要考察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以来在南洋流浪、流亡或逃亡的革命作家群的南洋书写,并与五四留洋作家群、海派作家群的南洋书写及国内左翼文学进行分析、比较。革命作家群的南洋书写受国际革命思潮影响,由虚构向写实过渡,“南洋”成为国人/国族的论述场域,“革命”成为主流,文本呈现出悲壮决绝的气息,回荡着革命知识分子对南洋不绝于缕的浪漫绮想。艾芜的滇缅边地书写影响了数代知识分子,既有文学史意义,更具有文化地标影响;杨骚的南洋书写忧愤深广,从中可梳理出这位人格丰满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与思想史线索;流亡作家洪灵菲、沈兹九、胡愈之、巴人的南洋书写朴实真挚,浪漫悲壮。西方作家的流亡书写对自由、强权、暴政、战争、革命作了较为持久深入的思考,具有一定的终极色彩,中国作家在流亡中既有短暂的“游心”之举,更秉持着感时忧国的儒家意识,对新中国的浪漫想象显示了知识分子深广的忧患意识与浓厚的浪漫情怀。

上篇总结旨在对近现代南洋书写进行文化学考察,通过这些南洋文本所展现的域外图景来透视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总体而言,这一书写体现了知识分子在晚清以来激进的现代性目标中,在异彩纷呈地展示个人的艺术才情与文化抱负的

过程中向传统回归的趋向。现代作家所塑造的南洋形象既部分地反映了南洋的真实,也传递了自身的文化传统。其中的“自我东方主义”与其说是东方自傲的“历史传统”的遗存,毋宁说是近现代知识分子在面临传统遭遇巨变,西方话语长驱直入的历史语境中,以安魂的方式来抵抗革命、动荡等时代变革,在精神家园无以安托的时代实现“诗意地栖居”。相比于西方知识分子用“异”的眼光观照南洋或者东方,中国知识分子多的是“同”的视角,其中有南洋与国内文化、历史及社会形态等方面的相似性,也反映了他们较为封闭的思维结构和源远流长的“载道”传统,从而造成部分文本较为狭隘,视野有待提升。

第六章主要对当代南洋书写的概况进行探讨。从表现对象的角度挖掘出中国远征军、原国军与流亡知青这三大群体。20世纪中国南洋书写表现出启蒙、革命与消费三大主题。当代南洋书写中,革命/战争占据主导,南洋革命不同于国内革命,主要是以失败为底色,呈现出悲壮、崇高与深沉之美;当代南洋书写抵制遗忘、仰望父辈,在世俗化时代弘扬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情怀,它具有反思政治、革命、历史、人性与现代性的意义。80年代后期以来,这一书写呈现出多元化特征,消费性话语开始蔓延。

第七章主要对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远征军书写进行梳理,它经历了战地报道、纪实文学上的历史还原、文学想象与虚构三个阶段。现代远征军书写在弘扬民族精神的同时,昂扬悲壮,表现出对战争个体的关怀,对生命的深切哀痛,具有一定的哲理意蕴。西南联大写作群体显示了现代知识分子在个体生命意识之外的政治情怀。当代远征军书写塑造了传统军人群像,文风悲壮。在异域元素的渲染中,它或承担着作家对新国民性的反思,或隐含着文化消费的主题。现代远征军书写重个体,语言有古朴之美,是一种“有情”的书写;当代远征军书写重理性之思,苦难意识稍弱,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远征军书写开始呈现出大面积的后现代消费盛景。以周梅森、张廷竹为代表的新时期远征军书写几乎与当代文学史的进程同构,他们无论是对人性的挖掘、对历史复杂性的思考还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品格的弘扬都体现了新时期知识分子的启蒙意识。

第八章主要探讨传统作家群的南洋书写。其中有岭南作家群陈残云、杜埃、黄浪华、秦牧,闽籍作家群司马文森、白刃、杨金远、王啸平,以写中缅边地小说闻名的反映南洋流亡、展示异域奇风异俗的苗族作家李必雨等。这一群体多以传统现实主义手法回望往昔岁月,表达“回归(祖国)”的主题。他们对南洋风情及家乡风俗较为熟稔,表现出现代家园感,具有传统的忧患意识与一定的现代反思精神。

最后一章从多元化角度探讨当代南洋书写。考察新时期以来的南线书写,挖

掘其文学史意义并对这一写作现象进行反思。南线书写经历了从人性到战争本体的反思,但迄今尚未产生有足够分量的文本;当代南洋书写在启蒙与革命的主题中高扬起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旗帜。陈河在深入挖掘历史记忆的过程中表现出寻找英雄、抵抗遗忘的意味;王安忆展示了南洋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社会历史嬗变;邓一光将理想与现实倾注在主人公天赫、天扬身上,讲述了后革命时代理想主义者的殊途同归。其中王安忆的后期书写反映了社会思潮与文学思潮的多元化,并与曾焰的知青日常叙事共同展示了当代南洋书写的生活政治追求。值得注意的是,“南洋”作为异域符号,在文本中不止于凸显其地理空间意蕴,与传统作家群南洋书写的社会历史符号相比,“南洋”更多的是作为艺术文化符号而存在,承担着革命、战争、流亡与浪漫、理想等历史功能与审美功能。

下篇总结认为,当代南洋书写关注民族命运、人类生存等重大课题,呈现出较为深沉的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色彩。“南洋”从近现代文学中的实践、体验与想象,发展为更多地趋向社会历史化与审美化。另一方面,当代南洋书写也实现了对传统的回归,展示了南洋的社会民俗文化,体现了在社会动荡不宁之际,当代知识分子的庄禅情怀。

如果说,百年中国文学,“忧患是它永久的主题,悲凉是它基本的情调”,“拒绝游戏又放逐抒情”^①,那么,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中的南洋书写在革命、战争等历史性话语外,还展示了青春、理想、英雄、漂泊、流亡等精神性话语,呈现出浪漫传奇、悲壮热烈的审美风格,从而显示了对世俗化时代的反拨。

本书将综合采用美学、形象学、文化学、社会学、人文地理学、历史学等研究方法,运用知识分子、东方学、公共空间、现代性等理论视角,对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中的南洋书写进行考察。就题材角度而言,本书挖掘了不少鲜为人知的文学、文化学与社会学史料,如曾焰、王曦、杨美红等流亡知青的地下书写,丰富了知青文学的面貌。

^① 谢冕:《总序一:辉煌而悲壮的历程》,见谢冕:《1898:百年忧患》,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页。

目 录

上 篇

绪 论	1
第一章 五四留洋作家群的南洋书写	37
第一节 老舍:《小坡的生日》的政治性书写	38
第二节 徐志摩:“浓得化不开”的欲望书写	48
第三节 郁达夫:南洋书写的怀旧与启蒙	56
第四节 小结	66
第二章 许地山宗教背景下的南洋书写	67
第一节 故事的传奇浪漫	68
第二节 南洋的宗教性书写	70
第三节 “南洋弃妇”的书写模式	75
第四节 南洋风情的展现	76
第五节 怎样的南洋形象?	78
第六节 小结	80
第三章 另一种想象——海派作家群的南洋书写	81
第一节 张爱玲:“他者”的文化想象	81
第二节 南洋的情欲想象	90
第三节 被媒体塑造与定型的南洋	97
第四节 小结	100
第四章 游记中的南洋风景与作家心态	101
第一节 梁启超:传统之思与归隐之梦	103

第二节 斐儿:南洋风景与都市疗伤	110
第三节 巴金:南洋书写的浪漫沉重	114
第四节 小结	118
第五章 流亡路上的“青春之歌”	
——革命作家群的南洋书写	119
第一节 南洋书写的概况与基本特征	124
第二节 杨骚:南洋书写的感伤与忧愤	146
第三节 流亡者的不同书写	152
第四节 小结	175
上篇总结	177

下 篇

第六章 中国当代南洋书写概论	203
第一节 当代南洋书写的对象及概况	203
第二节 当代南洋书写的主要特征	216
第三节 小结	256
第七章 扬威异域의 远征军书写	257
第一节 远征军书写的基本概貌与特征	258
第二节 周梅森与张廷竹:人性与历史的探索	283
第三节 小结	296
第八章 传统作家群的南洋书写	299
第一节 异中见同的传统书写	302
第二节 岭南作家群的南洋书写	306
第三节 司马文森:悲凉境遇下的“淘金”	310
第四节 杨金远:宏大背景下的生存与抗争	316
第五节 小结	322

第九章 多元化的南洋书写	324
第一节 多元渐变的南线书写	324
第二节 陈河:悲壮冷静的丛林战争书写	333
第三节 王安忆:复调的南洋书写	342
第四节 拯救与逍遥:《我是我的神》的诗性书写	354
第五节 小结	361
下篇总结	362
结 语	365
参考文献	376
后 记	408

绪 论

作为汉语书写的发源地,中国大陆位处中心的视野长期被作为观察与参照的主流生产,而文人的境外留寓预示了迥异的文学实践及可能^①。近现代以来,随着士人流动步伐的加速,国人大规模的迁移、流亡,域外书写始成一时之热,新的知识眼光的形成使这些书写迥异于此前对异族非蛮即夷、荒诞不羁的想象。“一般说来,在一个民族或国家的任何发展阶段,都存在着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的交流”^②。近代中国经历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随着封建王朝的衰败解体,国门被迫打开,开放的格局逐渐形成。文化上的频繁碰撞、交流使封闭帝国对外开始有了新眼光,中华民族的眼界日渐开阔,思想上相继完成了从“以夏变夷”到“师夷制夷”的转变,并以五四为开端,大力弘扬西方的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的现代思想。这种转变自然离不开域外视野,其中留学生运动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18年,徐志摩在《致南洋中学同学书》中写道“我国自戊戌政变,渡海求学者,岁积日增。”^③五四以来,“欲输世界文明于国内,必以留学泰西为要图”已成时代共识。大批有志之士负笈海外,奔赴欧美、日俄等国,或考察政治制度,或学习科技文化知识,或宣扬革命真理,从而将老中国这艘千疮百孔、摇摇欲坠的慢船推向世界现代性进程中。前于留学潮,对中国与世界之关系作出目光调整的还有一批政府官员、学者与民间志士,其出使、考察、游历、流亡等,意味着与一种新的文明、文化发生交流与碰撞,并进一步动摇了封建帝国的纲纪伦常。无论如何,地理空间的移动生成了需要被内在自我处理的“现代”意识。他们对个人域外经历的表达也构成了最初的中西文化冲突的投影。这些具备文人性格的知识分子,其文本作为出走与落脚之间

① 参见高嘉谦《时间与诗的流亡:乙未时期汉文学的离散现代性》,见王德威,季进主编《文学行旅与世界想象》,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4页。

② 周晓明:《多源与多元:从中国留学族到新月派》,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71页。

③ 徐志摩《致南洋中学同学书》,见韩石山编《徐志摩全集·第一卷·散文(1)》,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8页。

的心灵踪迹,展现了他们在遭遇强势西方时为民族、社群把脉、定位及自我形塑的心理历程。这些文本从日记、书信、回忆录、政论到小说、散文、游记、诗歌,题材、体裁丰富多样,展示了在面对异彩纷呈的近(现)代文明时,处境不一的知识分子的不同文化心态。1980至1986年间,学者钟叔河编选了《走向世界丛书》(36种),收录了1840年到1911年间国人访问东洋、西洋的记载。这些文字不是一般的国外游记,由内到外的目光调整预示着它们不再是从“天朝上国”前往“四夷蛮荒”猎艳搜奇的新山海经或天方夜谭,而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实录,具有重要的社会历史价值与思想文化意义。19世纪中后期以来,王韬、严复等走出国门的士人具有更加明确的政治目的。在相对发达的东洋、西洋的经历不能不使他们萌生某种进化意识:要想摆脱落后挨打的境地,实现近(现)代化,就不能不融入世界。他们将笔触伸向东洋、西洋,其中,美、英、法、意、日等国是其聚焦点。于是,社会状况、政治制度、文教设施、风土人情、山川风物等一一进入其视野。“游记作者往往扮演了双重角色:他们既是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建构者和鼓吹者、始作俑者,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集体想象的制约,因而他们笔下的异国形象也就成为了集体想象的投射物。”^①容闳的《西学东渐记》几乎反映了这一时期士人的共同心声:“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予后来之事业,盖皆以此为标准,专心致志以为之。”不惟近代如此,新时期以来,学界的关注重心依然是东洋、西洋。以谢清高1820年的《海录》为例,作者将其所游历的九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见闻按照西南海、南海与西北海分成三章,其中,“南海”主要指南洋群岛,而“西北海”则是欧、美、非、大洋各洲的总称——“也是我们最感兴趣的部分”^②。近代以来,知识分子将自身所处的时代危机与中国面对世界格局的社会语境相勾连,产生了一大批充满启蒙冲动的文本。“中国近代历史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她参与了世界,这时候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如何近代化、与近代世界合拍,所以闭关的政策行不通了,一定要开放,包括我们的思想认识,要有世界的眼光。”^③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也就是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过程。然而,在走向世界的历史图景中,有一个几乎不被重视的场域——南洋,它既

① 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论文翻译、研究札记(代序)》,见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6页。

② 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7页。

③ 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写:《上学记》(修订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111~112页。

是知识分子由东方走向西方的重要通道,也是历朝历代革命者、政治异端者、流民、流寇的首选之所,更是国人淘金的聚集地。作为通往西洋的重要港口,大部分走向世界者都有在南洋驻足停留的经历。近代史上,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有过南洋生活经历并留下了不少相关的文字,这些窥奇猎艳的诗文除异国情调外,还具有较强的文化象征意义。丘菽园 1901 年出版的《挥尘拾遗》说明马来亚文坛活动的状况时写道“近四五年中,余所识能诗之士,留寓星洲中,先后凡数十辈,固南洋荒服历来未有之盛也。”^①文中举出的著名诗人有许南英、于斌椿、左秉隆、康有为、梁启超、丘逢甲、胡汉民、汪精卫、陈宝琛、黄遵宪等。如果说,东洋、西洋以其现代性图景为近(现)代士人所关注,在大部分士人眼中,前现代南洋恍然是停滞的、带有些许老中国气息,尽管其中已出现迥异于此前的殖民色彩。在东洋、西洋的现代性氛围中,南洋有着接近天籁之声与原始气息的椰风蕉雨、海岛山芭。于是,由东洋、西洋到南洋,他们在情感上经历了一番从欧风美雨的惊诧感到“芭蕉结子碧离离,椰树成林拂翠丝”(斌椿《至印度锡兰岛》)的浪漫之旅,他们也在南洋浓厚的佛禅氛围中产生望峰息心的出世之感。不仅是近代知识分子,在 20 世纪南洋书写中,南洋即使使部分知识分子不能不感受到时代的变革,产生“广求民瘼,观纳风谣”的进步意识,它最初给旅者带来的还是中华远古文明的气息,一种体悟传统文化的场域。他们多为南洋独特的民俗风情所感染,恍然体味到一个宛若桃花源的古中国图景。随着知识分子流动步伐的加快,南洋开始引起他们关于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革命与启蒙等命题的思考。可以说,近现代知识分子在南洋的驻足停留及体验同样是国人走向世界的实录,有其文化意义与社会学、历史学价值。

—

“南洋”即现在的东南亚国家,学界对其并未有统一的界定。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东南亚在元代以前被称为南海或西南海;明代仍称之为西南海外,又称之为东西洋,到明末而至清代,东南亚常以南洋称之^②。“南洋”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一个概念,与“北洋”相对应^③。关于“南洋”的定义,学界众说纷纭。李长传认为,“所谓‘南洋’者,以其在我国之南方,而远隔重洋也。其地理位置殊难确指,说者谓有广义狭义二说:广义之说自后印度半岛、马来半岛、马来群岛,以迄澳大利亚、纽丝伦,

① 丘菽园:《挥尘拾遗》,上海,1901 年。

② 参见(美国)沈己尧:《小引》,(美国)沈己尧:《东南亚——海外故乡》,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5 年,第 2 页。

③ 陈中行:《中国人到东南亚》,香港:自由出版社,1956 年,第 2 页。

东括太平洋群岛,西包印度,皆谓之南洋。狭义之说则仅指马来半岛及马来群岛为南洋。”^①许云樵认为,“南洋者,中国南方之海洋也,在地理学上,本为一暧昧名词,范围无严格之规定,现以华侨集中之东南亚各地为南洋。”^②王赓武在《南洋华人简史》中列引了冯承均等人的观点,但并未对“南洋”作具体判断^③。“南洋”这一称呼自清代开始通行,包括20世纪初的英属海峡殖民地、英属缅甸、荷属印尼、美属菲律宾、法属安南、二战时期的日据太平洋群岛等在内的广大地理区域。二战期间,美英盟国为划分对日作战区域,将其明确称为东南亚战区。此后,各国政府及学界开始普遍采用东南亚一词^④。随着南洋民族国家的构建,大中华趋势被打破、颠覆,“东南亚”概念取代了“南洋”。从地理方位术语的角度而言,“东南亚”可视为两个地理区:“大陆东南亚”(mainland Southeast Asia)和“岛屿东南亚”(insular Southeast Asia)^⑤。大陆东南亚包括缅甸、越南、老挝、柬埔寨诸国,岛屿东南亚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菲律宾和印尼。本书中的“南洋”并不拘泥于严格的地理区域划分,而是一种观念性与参照性存在。由于滇西与缅甸文化地理形态上的部分相似性,本书也将有关该部分书写的若干文本纳入“南洋书写”的范畴。从文学角度考察,“‘南洋’一词较之‘东南亚’不仅仅多了一种诗意的文学联想”,就历史学角度而言,南洋与中国历来渊源深厚,南下的华人无论是多难兴邦之际还是和平建设时期,始终眷念故国,“‘南洋’一语更能传输他们的心态。”^⑥

中国与南洋的交往历史悠久。远在秦朝,秦始皇就已在东京置象郡。汉武帝设九郡于安南。东汉的马援将军更是南下征服了交趾。东晋至南北朝时代,中国与南洋、印度的海上交通逐次开放。唐代威及南国,当时向唐朝进贡的,就有林邑(即越南)、扶南(即泰国)、文麦(即婆罗洲)、末罗游(苏门答腊的中北部诸地)、阇婆(苏门答腊东部)、诃陵(即爪哇)诸地。贸易、航海业的发达使移民南洋的国人开始增多,他们被当地人称为“唐人”。宋末以来,中国的商贾和航海者在南洋的活动日益重要。元世祖曾远征爪哇。及至明清,虽然政府禁止国人海运,但偷渡至

① 李长传:《南洋史纲要》,香港:南华出版社,1959年,第1页。

② 许云樵:《南洋史》(上卷),吉隆坡:世界书局,1961年,第3页。

③ 王赓武著,张亦善译:《南洋华人简史》,台北:水牛出版社,1987年,第7~8页。

④ 参见梁英明:《东南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页。

⑤ 引自曾少聪:《漂泊与根植:当代东南亚华人族群关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页。

⑥ 南治国:《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南洋之旅》,新加坡国立大学2005年博士论文,第11~12页。

南洋者一直络绎不绝。至明朝和清前期,国人的南洋路逐渐拓宽。明代郑和七下西洋,到过南洋的许多地区和国家。“近代中国海外移民人数之多……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从地域分布上看,中国移民主要局限在中国南部周边热带地区。”^①移民南洋的国人普遍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他们也将中华传统文化带往移居地。华侨在南洋建国的也有不少,但他们去南洋以谋求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政治上求发展的很少。

中国古籍对南洋多有记载。汉代张骞描述过滇缅道上的贸易往来情况。《史记》、《汉书·地理志》等文献记载了公元1世纪左右,中国与缅甸、越南等国已互有来往。《梁书》、《宋书》、《玉海》等记载,南北朝时期,我国与马来半岛、婆罗洲上的一些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隋书》记载了我国与马来亚地区古国赤土的交往。宋代记载南洋情况的著述有《宋史·注辇传》,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赵汝适的《诸番志》等。在宋末陈元靓的《岛夷杂志》中,佛啰安国(约在今马来半岛境内)曾居住着华侨。元代航海家汪大渊两次泛海,遍历南洋各岛国,1349年完成《岛夷志略》一书,第一次以明确的文字,记录了新加坡和婆罗洲北部的华侨及其商贸活动。周达观随元朝代表到达真腊,其《真腊风土记》报告吴哥窟佛寺之雄伟,说明高棉族之黄金时代。《明史·马刺加国传》详尽记载了最隆重的一次国王“朝贡”。《明史·外国卷》记载了华人逐渐深入菲律宾内地定居的情况。《明史·郑和传》记载了郑和自公元1405至1433年间,前后七次,一行数万人,经南洋各地抵达非洲东岸,历三十余国,比欧洲殖民主义者早一百年的远航盛举。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费信和巩珍归国后分别写成《瀛涯胜览》、《星槎胜览》和《西洋番国志》。17世纪福建漳州人张燮的《东西洋考》记载了南洋及日本各地情形,资料翔实。18世纪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与王大海的《海岛逸志》、19世纪谢清高的《海录》都记载了南洋华侨的情况。沿海各省的地方志也有不少关于国人移民海外的记载。如明代何乔远的《闽书·岛夷志》、清代周凯的《厦门志》、邓廷祚等撰写的《海澄县志》、李钟珏的《新加坡风土记》与力钧的《槟榔屿志》等^[1]。南洋诸岛国多信奉佛教,其中印度为佛教发源地。自东晋始,佛教流行于中国,法显偕伴数人,在公元399至413年间,从长安出发,在外十四年,游三十多国,其中曾至狮子国、耶婆提,后著有《佛国记》(或称《法显传》)。唐代高僧至西方诸国习佛者甚多,以义净记载南洋情况为最详。公元671至695年间,义净经历三十多国,曾经爪哇、苏门答腊及马来半岛之吉达等地,停居室利佛逝五年,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展现了当时中国与

① 丘立本《从世界看华人》,香港:南岛出版社,2000年,第19~22页。

南洋的交通盛况。唐高僧中在佛学方面取得最大成果者为玄奘。公元 627 至 645 年间,玄奘西行求经,历一百三十多国。他虽未至南洋海域,其所著《大唐西域记》却记载了当时南洋各大国分布情形。20 世纪以来,黄遵宪、苏曼殊、康有为、梁启超、许地山等都有在南洋求禅觅佛、考察圣迹的经历,他们也将之审美化,凝聚个人的情感内蕴,创作了不少寄意深远的篇章。

中国与南洋的交往在历代文人的笔下也不断地得到体现。地缘上的毗邻关系使南洋成为国人的迁徙地和避难所。汉末数十年间,国内动荡不安,而交趾“境内无事”,民皆乐业,成为中原人士理想的避居场所。北方士大夫南下避居者难以计数,他们或隐居,或授徒,或从政,或游学。与汉代文人学者主要为了避难不同,唐代诗人留寓安南,大都因贬谪而被迫作客异乡。杜审言、沈佺期、刘禹锡、韩偓等诗人都有被迫寄寓越南的经历,其中,杜审言在流放峰州(今永富省)时,写下《旅寓安南》一诗:

交趾殊风候,寒迟暖复催。
仲冬山果熟,正月野花开。
积雨生昏雾,轻霜下震雷。
故乡逾万里,客思倍从来。

展示了安南的气节风物与习俗掌故,表达了感怀身世、思乡忆归、渴望结束流放生涯之心声。唐骁卫将军高骈被派往安南招讨南诏犯军,随后出任驻安南静海军节度使,在征旅中及任职期间,曾写下《叹征人》、《赴安南却寄台司》、《过天威径》、《安南送曹别敕归朝》、《南征叙怀》等诗篇。中国文学在南洋的传播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传统,其历代最发达的文体,如先秦诗歌、散文、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最具声望的诗人作家,如屈原、陶潜、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一直到现代的鲁迅、郭沫若、巴金、茅盾、曹禺等都在越南有着广泛的流传与深刻的影响。越南的传统文学为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汉文学,儒家思想是其思想内核。17 世纪,中国戏剧就已随华侨传入暹罗,中国各种体裁的小说、故事在此得到了很好的传播。暹罗有重用能诗善文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传统。1936 年鲁迅逝世,当地开展了追悼大会和各种有关的纪念活动。

一直以来,中国文学就有书写异域的传统,南洋书写可以说拓展了中国域外书写的领域。沈庆利认为,“域外小说”为“中国现代作家创作的、以异域为背景、以